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〇〇鼓：〇米人〇〇教文化的重要〇体和象征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〇, 〇玲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8985

萨满鼓——萨米人萨满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

Sami Shaman Drums: The Important Carriers and Symbols of Sami Shamanic Culture

吴凤玲

WU Wenling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Sami shaman drum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and symbols of Sami shamanic cul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of Sami shaman drums: their appearances and types, their roles as musical instruments in shamans' ecstasy, their functions in the divination of shamans and ordinary male parents, and their roles as carriers of the Sami's conceptual world.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 performance of Sami shamanism and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序言

萨米人的萨满鼓是萨米人萨满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本文以萨米人的萨满鼓为切入点，通过对它的外观和类型、它在萨满的昏迷术中发挥的乐器和法器的作用、它在萨满和普通男性家长的占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在表达萨米人的观念世界上的载体作用等四个方面的探讨，总结了萨米人的萨满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现。并进一步认为萨米人萨满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表现的成因要从其既处于亚欧大陆北部环北极的萨满教核心分布区，又是这一区域向西延伸的部分的地理位置，和萨米人与周边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和基督教文化长期互动和融合的历史中去追寻。

萨米人 (Sámi)¹⁾ 是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四国的一个族群，作为这四个国家中的原住民和少数族裔，萨米人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萨米语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在历史上，萨米人原生的本土信仰——萨满教是其独特的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与萨米人传统的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相适应的一种信仰形态。萨米人的萨满教活动早在12世纪就见于由一个匿名的教士所著的《挪威历史》(*Historia Norwegiae*)一书，萨米人因此成为萨满教实践最早获得记述的一个族群。萨米人的萨满教在经历了17和18世纪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基督教的宣教，在18世纪走向衰落，并在18世纪末最终被基督教所取代。尽管萨米人的萨满教信仰和实践已经成为消失的传统，但是历史上的相关文献记载，特别是在基督教传入的时代传教士们对于萨米人的“异教”信仰的记述和官方和教会对于萨米人的“异教”信仰和实践的法庭审判

记录,使后世学者对萨米人的萨满教的研究成为可能,并因此奠定萨米人的萨满教研究在国际萨满教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著名的宗教史学者瑞典学者阿克·胡特克兰茨(Åke Hulkrantz)指出:萨米人的萨满教,作为处于环北极的萨满文化核心地带上的萨满文化形式,“它在许多方面都基本与西伯利亚萨满教类似,并且是一种与后者有着相同高度的类型。事实上,萨米人萨满的蛰伏(torpor)似乎偶尔比他的西伯利亚同行还要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萨米人的萨满教是在更东部的芬兰—乌戈尔人中发现的萨满教的向西延伸的类型”(Hulkrantz 1992: 143)。萨米人的萨满教既体现着欧亚大陆北部萨满教核心区普遍性的特点,也体现着其在地理上向西延伸而发展出的特殊性,萨米人的萨满教在萨满教研究史上的独特地位集中的体现在作为萨米人的萨满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的萨满鼓上。本文就将以萨米人的萨满鼓为切入点,探讨萨米人的萨满教的相关特点,分析它的普遍性的特点是什么?它自身的特殊性又体现在哪里?这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因又该如何去认识?下面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萨米萨满鼓的形态。

1. 萨米萨满鼓的外观和类型

根据文献材料、考古发现和对传世萨满鼓的比较研究,学界对于萨米人中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萨满鼓的外观和类型有了相当的认识,并达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萨米萨满鼓的外在特征的共识奠定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1.1 萨米萨满鼓的外观

萨米人的萨满鼓作为一个整体由鼓本身、鼓槌和鼓的指示物三部分组成。萨米萨满鼓与大多数族群的萨满鼓一样,是单面的手鼓。长度在30—40厘米。其鼓本身的形状为椭圆形的,通常有着木质的框架,在框架之上的一面覆盖用鞣制过的驯鹿皮做的鼓膜。鼓膜上有用赤杨树皮中流出的汁液绘制的图案。鼓面上的图案可以被分为自然的和象征的两种:自然的图案描绘的是萨米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狩猎和其他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主题,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关于几百年前萨米人的物质文化的有效信息来源来为后人所了解和研究;象征的图案描绘和代表的是各种神、精灵和基督教的圣者,以及他们邻近的地区一些常见的内容,如牧师、教堂和地区司法官。鼓的背面是用皮绳绑在上面的各种代表着力量的物品,如熊的爪子,熊的阴茎骨和熊的牙齿。鼓槌通常是用驯鹿的角制成的,形状是T形或Y形。鼓的指示物通常是一个小乳牛的颞骨,或绑着一些小环的专门雕刻的三角形兽角,有时是一个单个的大的圆环(象征着太阳,或万物的来源)。

虽然传世的萨米萨满鼓很多都只有鼓本身,而没有鼓槌和指示物两个附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它们从收集到收藏的过程中丢失,一方面可能因为收集者没能将它们作为萨满鼓的整体的一部分而收集。但是学界对于萨满鼓的研究,很早就是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例如意大利人类学家曼泰加扎(Paolo Mantegazza)是第一个对收藏于罗马的萨满鼓的图案进行阐释的学者,在对其进行阐释得过程中,他能够意识到保存的三个部件:鼓本身(*runebom*)、鼓槌(*coarvevæver*)和鼓环(*vuorbe*或*væiko*),构成了一个整体。

“鼓槌是一个T型的由驯鹿角做成的棒状物，有时其上包裹着皮革，用来敲鼓。鼓环或者是一个其上悬挂着许多小环的铜环，或者是一个由骨头做成的三角形，它代表着太阳，当人们用鼓占卜时，将三角环放在鼓中心绘制的太阳图案上”（Pentikäinen 1997: 34-35）。

成书于十二世纪的《挪威历史》一书，记述了一个很典型的萨满降神会，这是萨米人的萨满教实践首次见诸文献。在这一记述中，描述了一位萨米人的萨满——诺艾迪（*noaidi*）为了给一位生病的妇女治病，在萨米鼓的辅助下，施行昏迷术，派出自己的灵魂，进行灵魂旅行，在他的助手神灵的帮助下去找回病人的灵魂，以帮助她恢复健康的经过。不幸的是，这位萨满在履行他的职责的过程中遭遇了一个敌对萨满的助手神灵攻击，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了，另一个萨满代替他，并在昏迷术中成功的战胜了那个敌对萨满，解救了病人的灵魂，帮助病人恢复了健康。《挪威历史》的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萨米萨满鼓，是已知的最早的萨满鼓，它在这一降神会中作为乐器和法器发挥着帮助萨满施行昏迷术的作用。在这一记述中，作者并没有提到鼓槌和鼓的指示物两个部件，显然最早的萨满鼓是没有这两个附件的（Zachrisson 1991: 86）。从鼓槌和鼓的指示物在鼓占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来看，它们的出现应该是与萨满鼓开始发挥占卜的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功能相对萨满鼓在萨满昏迷术中发挥的作为乐器和法器的首要的功能，显然是第二位的功能。下图为一个由鼓本身、鼓槌和鼓的指示物三部分组成的萨米萨满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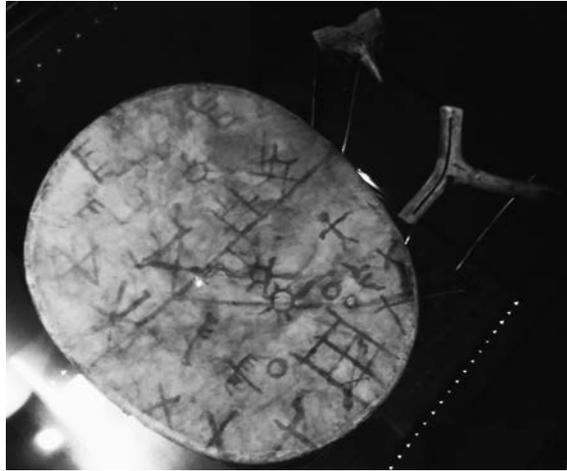


图1 由鼓、鼓槌和指针三部分组成的萨米鼓
(瑞典约克莫克萨米文化博物馆。作者摄于2011年10月20日。)

1.2 萨米萨满鼓的类型

a. 基于萨米萨满鼓的形制划分的类型

历史上的萨米萨满鼓曾经存在过两种类型的形制，最古老的形制是框架的类型，它的框架由一个整根木条弯曲成一个环形而成，这种框架的类型与西伯利亚的萨满鼓类似。根据瑞典学者恩斯特·曼克尔（Ernst Manker）于1938年出版的萨米萨满鼓的重要收集和和研究著作《拉普人的萨

满鼓》第一卷，这种类型的鼓后来不论在萨米地区南部还是北部都已经被逐渐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称为碗形的类型，这种类型的鼓为萨米文化所特有。从这种鼓最初见于对它的详细表述之时，它就远比框架的类型分布广泛，后来取代它也是发生在很早的时候。通常的观点认为框架的类型由于形体大，重量大的缺点而被人们逐渐放弃使用（Zachrisson 1991: 81）。在形状上，框架的类型是基本标准的椭圆形，而碗形的类型是顶端比底端稍尖的蛋形，参见下面两个对照图：



左面的鼓是碗形的类型



右面的鼓是框架式的类型

图 2

图案引自互联网 <http://www.utexas.edu/courses/sami/diehtu/giella/music/noaidi.htm#types> 2013年11月16日浏览。

b. 基于萨米萨满鼓的鼓面图案划分的类型

萨米萨满鼓的鼓面图案布局根据分布地区的不同，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来自同一地理范围的鼓的鼓面上，图案的布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根据鼓面图案对于萨米萨满鼓的分类上，目前学界普遍采纳的是恩斯特·曼克尔在他的两卷本的《拉普人的萨满鼓》中的分类：一、奥瑟勒（Åsele）类型，以太阳主题为中心的未划分区域的形式；二、瑞南（Ranen）类型，平行的被分为若干区域，同时也以太阳主题为中心；三、皮特（Pite）类型，有着类似的平行的分层，底部则未被本层，太阳的图案的主导地位不及前两种明显；四、托而你尔尼（Torne）类型，鼓面的图案平行的分为三层；五、芬马克（Finnmark）类型，图案分布在 5 个平行的部分；六、凯米（Kemi）类型，图案分为三个部分，但是分隔线在中心是分离的，可能是要表现一定数量的在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流。这种分类基本上对应的是操不同分支的萨米语的人群。这种分类还可以简化为图案布局以太阳为中心的南部类型（奥瑟勒类型）和以具有分层为特征的北部类型，而将这两种特征都

有所表现的类型，即既以太阳为中心，又有分层的特点的鼓，按照分布地域更接近南部或北部而将之归为其下的亚类型。

传世的萨满鼓大多为南部的类型，北部的类型相对较少，但是两种类型哪种相对比较传统，哪种受到外来的影响，如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人群和基督教的影响较多，学界并无定论。瑞典学者萨克里松（Inger Zachrisson）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不同部分的萨米人文化发展的不同很可能与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关，在南部的萨米人地区，萨米文化和北欧文化之间存在很多相互的文化采借的机会，但同时，文化边界地带通常也比中心地带保留更多的古老的文化特质（Zachrisson 1991: 81）。

2. 萨米人的萨满鼓与萨满的昏迷术

我们知道，萨满代表他的群体与神灵沟通，是通过昏迷术（trance）实现的，在此过程中，萨满派出自己的自由灵魂，在助手神灵的帮助下前往他界旅行，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伴随着萨满意识状态的改变，表现为进入一种入迷状态（ecstasy）。鼓是萨满的一个重要用具，它与萨满的昏迷术和萨满在昏迷中的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既是辅助萨满实施昏迷术的最为普遍的乐器，也是萨满在昏迷状态中的重要法器。

萨满鼓在萨满教仪式中发挥着辅助萨满实施昏迷术的乐器的作用。萨满进入入迷状态，通常是萨满鼓的有节律的敲击和吟唱的伴随下实现的。正如阿克·胡特克兰茨所言“从鼓的音乐和暗示的功能来看，鼓对于萨满来说自然主要发挥着作为助兴的工具的作用，它同烟草、蘑菇和其他的致幻的草药等一样是激发昏迷术的手段。不过，它的使用远比它们普遍”（Hultkrantz 1989: 11）。萨满鼓的这一作用，在中国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中也不例外，刘桂腾在对萨满音乐文化的系统研究著作中指出，在中国传统上信仰萨满教、在语系上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少数民族民族中，其萨满乐器尽管有着各种形制，但是其乐器的基本配置是以单面鼓为核心的，没有不使用单面鼓的萨满教仪式，鼓语是萨满以鼓为媒介与天界沟通的语言（刘 2007: 331）。

萨满鼓作为萨满所专有的用于萨满教仪式的法器是帮助萨满在昏迷的经历中发挥法力的重要器具。萨满发挥着人与超自然界的中介的作用，他在神灵、人类和鬼魂所居住的不同空间自由穿梭，代表他的群体和族人与对他们威胁和伤害的邪恶的超自然力斗争，他的重要法器萨满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萨满通过敲击鼓来将辅助神灵和守护神灵召集到鼓上为他提供帮助（Hultkrantz 1989: 16）；萨满在三界之间进行入迷旅行时利用鼓来充当他的交通工具；萨满在昏迷状态中同敌对的萨满或其他恶灵斗争时利用鼓作为保护自身的盾牌等等。

萨米人的萨满鼓在其萨满教实践中发挥着所有鼓在萨满教中的共同作用，即它同样首要地发挥着作为乐器辅助萨满入迷和作为法器在萨满昏迷术中发挥作用的作用。

萨满在代表他的群体通过昏迷术与神灵沟通时，需要在敲击萨满鼓的行为的引导下，逐渐进入昏迷状态，萨满鼓在这种情况下是辅助入迷的乐器和法器。萨满鼓的这一功能的发挥是在它首先从属于鼓这种乐器的基础上实现的，这其中鼓声的音乐和暗示作用，引导和促使萨满进入昏迷

状态。我们知道在萨满倒地进入昏迷状态之时，他便在助手神灵和守护神的帮助下开始了到超自然界的旅行，当萨满结束旅行，从昏迷状态中恢复正常状态时后，萨满便又持鼓敲击，并在观众的伴唱下吟唱，并结束仪式。鼓的敲击与昏迷状态的起点和终点都密切相连，也与萨满守护神和助手神的来和去密切相连，鼓在这一过程中还作为一种法器起到召集帮助萨满的神灵的作用。

在考古发现的碗形类型的萨米萨满鼓的木质框架上，有很多沙漏形状的镂空，这些孔洞代表着神灵借此进出的出入口（Zachrisson 1991: 81）。另外，在北部类型的萨米萨满鼓的鼓面，其天、人、地三界的分层的分隔线在中心位置不是贯穿的，而是有一个空隙，从纵向看，这三个空隙构成的线路象征萨满在三界间自由旅行的通道。这两点都佐证了萨米萨满鼓在萨满的昏迷状态中发挥的召集神灵的辅助作用。参见下面两图：



图3 有着沙漏形孔洞的鼓框架
(瑞典约克莫克萨米文化博物馆。作者摄于2011年10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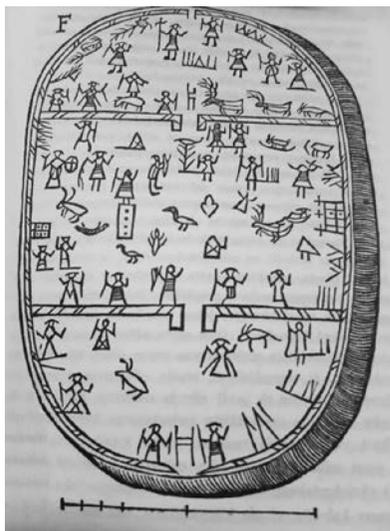


图4 有着三层的宇宙分布并且三层之间有空隙贯穿的鼓面图案
(作者摄于2011年9月30日。)

3. 萨米萨满鼓与鼓占卜

萨米萨满鼓首先是作为萨米人的萨满诺艾迪的用具存在，它在萨满行使他的职能充当人与神灵的中介时必不可少的工具，发挥辅助萨满入迷的功能。在这个首要的功能之外，萨米萨满鼓还广泛的被萨满和普通男性家长用来占卜，藉此来获得神意，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疑问。萨米萨满鼓被用于鼓占卜分为萨满的占卜和普通男性家长的占卜两种情况。《拉普人的萨满教》一书将占卜分为入迷占卜和鼓占卜，二者可以分别对应萨满的占卜和普通男性家长的占卜，其中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这两种利用鼓进行占卜的形式很有帮助。“萨满和某些普通信徒——但不是全部——都借助鼓来进行占卜。因此，有些场合需要萨满来进行鼓占卜，可能通常是他应群体的要求来进行的”

(Bäckman and Hultkrantz 1978: 50)。

3.1 萨满占卜

萨满进行占卜的情况，如《拉普人的萨满教》一书中所述有：1、与疾病的本质和起源有关的占卜（诊断）；2、针对远方的情况所做的占卜；3、为了狩猎和驯鹿的平安所做的占卜；4、对于未来的事件的占卜四种情况，都是与入迷术相联的。拉普人既可以在一种轻度的昏迷中获得他的守护神的信息，可以在深度的入迷中进行这种入迷占卜。在萨满占卜中需要用到鼓的情况，往往是发生在萨满通过昏迷术已经与神灵进行了沟通的情况下，之后再用品鼓占卜只是为了获得更确切和具体的信息，例如18世纪20年代瑞典传教士福伯斯（Forbus）记述的事例：

“……守护神习惯于指示诺艾迪，这样他就不用为了很小的事情总是要用到鼓或其他乐器去获得信息，而只是通过吟唱约伊克（joick）与守护神沟通，获得关于他询问的主题的答案。例如，当一个拉普人抓着一个孕妇的手以便知晓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就会吟唱约伊克召唤他的守护神。后者来到后宣布这位妇女怀的是个女孩。如果这位妇女对此还有怀疑，她就会要求这个拉普人用鼓为她再展示一遍，这时他才用上他的鼓，并显示了同样的结果，这时这位妇女对此就确信了”（Bäckman and Hultkrantz 1978: 48）。

萨满用鼓占卜有时也可能发生在入迷术之前，例如挪威传教士斯堪克（Skanke）给我们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发生时，一些诺艾迪就会聚到一起，跪在地上，努力通过神鼓找出将要发生什么。当面对不幸时，他们通过神鼓来占卜获得哪个神灵需要去取悦，他又想要些什么样的献祭的信息。如果献祭也不解决问题，诺艾迪就必须在他最强有力的助手神的帮助下进行一次到冥界的旅行，这个旅行显然是一次入迷的旅行”（Bäckman and Hultkrantz 1978: 53）。萨满占卜首要的是以与其职能密切联系的入迷占卜为特色的，萨满通过入迷术中获得神谕，得到占卜的结果。萨满的入迷占卜过程有时可能会需要用鼓来占卜，因此可能在入迷术之前或之后包含鼓占卜的过程（Rydving 2010: 41）。

3.2 普通男性家长的占卜

使用萨满鼓的进行占卜通常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性的萨满，普通男性家长使用鼓来进行简单的占卜的情况也很平常。不过他占卜的内容通常是与家庭的实际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例如，在官方和教会没收萨米人的萨满鼓时，萨米人的申诉就是“他们并没有用它来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只是希望用它来预见将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好的或坏的事情，例如他们到森林中的狩猎或渔猎会有什么结果，他们的畜群将会怎样等等”（Rydving 1991: 31）。

在占卜时，占卜者左手拿鼓，右手拿鼓槌，他会将鼓的指示物放置在鼓面上，指示物可能是一个金属环，也可能是有图案装饰的三角形的驯鹿骨。随着占卜者的敲击，指示物在振动的鼓面的带动下自由运动。占卜者就可以根据这种行为预见很多事情。例如，他可能据此决定他的群体在一片地域上的迁徙的方向；他到哪里可以找到丢失的驯鹿或为他的畜群找到一个放牧地点，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保护他的氏族免受野兽的侵袭。其他的他想要求解的问题可能是：最好

的狩猎地点在哪里，他计划的旅行什么时候动身比较好；他要献祭什么样的祭品给神灵或守护神从而避免严重的意外的伤害，等等。鼓同样也被用来决定神灵对于偷捕驯鹿、谋杀和其他的犯罪的惩罚（Pentikäinen 1997: 42）。

3.3 Nærö的手抄本：一个鼓占卜的实例的所体现的占卜的具体过程

对于鼓占卜的具体过程，早期的记述材料大多是一概而论的简单描述，只能给我们提供鼓占卜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人为此实施了鼓占卜，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了鼓占卜等简单的信息，没有一个从直接的观察者或参与者的角度对于鼓占卜的具体过程的描述。因此，记载于18世纪20年代的Nærö的手抄本虽然是一位传教士对一个鼓占卜的实际参与者的叙述的记述，但是它却提供了一个有助于我们了解鼓占卜具体过程的难得实例，因而是一份关于萨满鼓的研究的珍贵资料，为后来学者们所重视和研究，如第一个对现存罗马的萨米萨满鼓进行意义阐释的学者曼泰加扎就是基于这一资料来表述鼓的使用的。这里我们将Nærö的手抄本转引如下：

一个名叫安德列亚斯·利韦尔斯坦（Andreas Livortsen）的萨米人仅有一个20岁的儿子，他的儿子病得非常重以至于没有人相信他会再恢复健康。绝望的父亲用尽了他所知道的巫术，但都是徒劳。最后他决定使用鼓。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诺艾迪，但是按照传统的规定，在这样一个他自己的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上，他是不能自己向鼓问讯的。因此他派人去请他后妻的哥哥，这个人在诺艾迪的技艺上与他不相上下。在开始的仪式之后，这位妻兄将鼓环放在了正确的位置上，并开始用鼓槌敲击鼓，但是让人震惊的是鼓环直接到了死者的道路，非常接近死者的王国。这位父亲非常不安，特别是当他看到随着对鼓的敲击越来越剧烈，并伴随着各种咒语，鼓环就是不肯离开那里；最后，在他的妻兄的建议下，这位父亲答应给死者们献祭一个母驯鹿。之后当又开始敲击鼓时，鼓环移动了，但是它的位置并没有超出基督教道路²⁾，于是他的妻兄又开始敲击。但是这次鼓环又回到了死者的道路。这一次这位父亲答应献祭给撒旦一头公驯鹿，以换取他儿子的生命。鼓环又移动了，但是它再次到了基督教的道路上去，就是无法让它到鼓上那个对于萨米人来说象征着康复的图案的部分去。他的妻兄又第三次开始敲击，并吟诵了许多驱魔的咒语，但是鼓环还是回到了它最初的位置，即死者的道路，并停留在那里，直到这位父亲在前面答应的一公一母两头驯鹿的基础上，又答应献祭一匹马给死者的王国的诺艾迪，如果能够让死者们允许鼓环移向萨米人的棚屋，这样这位父亲就可以确信他的儿子将能活下来。但是这次，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不论怎么敲击，鼓环就是停留在死者的道路上；这预示着这个年轻人注定到死亡了。他的妻兄很疑惑，不能理解为什么鼓环给了一个更坏的预言，为什么神灵在接受了这样的祭品的许诺后会更加无情。最后他的妻兄采取了如下措施：他来到岸边拾起一块矩形的石头，在用许多驱魔的咒语使它神圣化后，他把它悬挂在棚屋的前方，之后他对着它躺倒，脸贴着地面，作了一个祈祷，之后他问撒旦为什么鼓环拒绝离开死者的道路，尽管已经向撒旦、死者和死者的世界的诺艾迪许诺了如此惊人的礼物。他之后听到了那位儿子代替撒旦给予的答案：这些答应的祭品必须立即献祭给他和其他的神灵，否则这个男孩就得死亡，除非有其他人能够代替他死亡。这些都是非常苛刻的条件，这位父亲不可能如撒旦要求的那样立即实践他的承诺，他手头既没有他答应的驯鹿也

没有他答应的马；他又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他儿子性命的人呢？因此，如果这位父亲想救活他的儿子，他就除了替他儿子去死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并且他决定就这样做。当他做出这样一个爱他自己的儿子胜过自己的灵魂的决定时，他的妻兄立即又再次敲击鼓。在未开始敲击时，鼓环仍旧停留在它最初的死者的道路的位置，但是在开始敲击之后，他开始移动并到达了萨米人的棚屋这个图案的区域，这预示着生病的儿子将重获健康和生命。最奇怪的事情是儿子立刻开始好转，而同时他的父亲却进入了病重的状态。在第二天的饭后，儿子彻底康复了，而同时他的父亲却可怜地死去了，将他的灵魂给予了魔鬼。他的儿子感谢父亲为他所做的牺牲，按照父亲临终的遗愿献祭了一个公驯鹿给他的灵魂，这样他就能在死者的世界比较舒服并自由地行动。

这个萨米青年名叫约翰（Johan），他所述的经历发生在5年以前，现在他在海尔吉兰德（Helgeland）教区作服侍，他和其他的萨米人及他们的妻子在我的家中我也在场的情况下，讲述了这个故事，当时是今年（1723年）1月的一天（Pentikäinen 1997: 40-41）。

从上述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鼓占卜是一个萨满占卜的例子，萨满首先开始用鼓占卜，在得到不利的神意时，许诺献祭来取悦神，以换取期望的好结果，但是在许诺献祭依然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时，实施鼓占卜的诺艾迪使用一种专门的法术进一步与神灵沟通，寻求解决的办法，虽然我们从叙述中看诺艾迪这时所使用的法术并非我们可以明确判断为昏迷术的行为，但至少是诺艾迪具备的与神灵交流的法术。这个相对复杂的鼓占卜的实例，因为事件的严重性，其占卜的过程充满了占卜者面对神意的艰难抉择，诺艾迪作为中介与神灵的沟通，和许诺献祭作为换取神灵满意的手段的使用。相比之下，普通男性家长所做的一些关涉日常生活的鼓占卜，占卜的过程更多的是通过对鼓面图案的解读来了解神意，并按照神意来实施，而没有与神灵交涉，改变神意以对己有利的过程。但是无论是萨满占卜还是普通男性家长的占卜，对神意的知晓，都是通过解读鼓面与神意有着关联性的象征图案而实现的。

3.4 对于同样发挥鼓占卜功能的萨满和普通男性家长的角色比较和思考

结合萨满占卜与普通男性家长占卜发生的情况和 Nærö 的手抄本所具有的一些别的文献材料所不具有的独到的叙述，我们对同样发挥鼓占卜功能的萨满和普通男性家长的角色有如下比较和思考：

首先，萨满占卜具有公众服务的性质，普通男性家长的鼓占卜具有服务于自己家庭内部的性质。依据 Nærö 的手抄本的叙述，这位父亲是在作为诺艾迪用尽了他掌握的“巫术”手段之后都无效才试图求助于鼓占卜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可能包含萨满入迷过程）鼓占卜，应该是萨满法术中最有效力的方式，是高出萨满所掌握的其他法术并在它们都无效的情况下才使用的。然而作为诺艾迪他不能将鼓占卜用在个人化的事情上，这似乎意味着萨满占卜作为最有效力的萨满技艺不能服务于自己和自己家庭成员，而必需服务于群体的成员，具有公众服务的性质，而不能象普通的男性家长那样用鼓占卜服务于自己的家庭。

其次，萨满占卜的公共服务性质，与萨满在萨米人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人神中介的身份是密

不可分的；普通男性家长占卜的家庭服务性质，与他作为家长是家庭生产生活的总体负责者的身份是密不可分的。前面提到的萨满占卜的四种情况，尽管其过程可能不包括用鼓占卜的程序，都是萨满在对群体整体或单个群体成员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的。萨米人各群体的传统中是否都有如 Nærö 的手抄本所述的那样对于萨满占卜不能用于个人化的情况的要求，由于可用的资料的局限，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萨满因为掌握入迷术等不为普通人不掌握的与神灵沟通的能力，他的萨满占卜是群体成员在重大的危机时刻可以求助的最终且最重要的解决方案。对于萨满的鼓占卜不能用于个人化的事件的限制，我们可以作如是猜想：这是传统对于萨满权限的约束，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多和更好的发挥在群体中的人与神灵间的桥梁的作用。而普通男性家长作为家庭生产生活的总负责者，需要在很多生产和生活的场合做出决策，鼓占卜是其获得神意，为其决策提供依据的重要手段。

再次，在萨满占卜和普通男性家长占卜之间存在的分别应用于公共服务和家庭服务的分野，与萨满和普通男性家长的技艺和能力上的差异有很大关系。萨满掌握与神灵沟通和交涉的入迷术，因此，萨满占卜是包含入迷术这种效力最强的获得神意并与神灵沟通的形式的占卜，普通的男性家长不掌握入迷术，他们的占卜更多的是通过对占卜与鼓面图案之间的关联的解码，来了解神意，并基于占卜的结果决定进一步的行为。

4. 萨米人的萨满鼓与萨满教的观念世界

萨满鼓的鼓面上绘制的各种或具象或抽象的图案作为一个象征体系体现着群体的萨满教观念，使萨满鼓成为表达萨满教观念的一个重要媒介。在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尽管萨满鼓上并不必然要有图案的装饰，但是大多数的萨满鼓上还是有一些装饰图案，其中尤以阿尔泰诸族的萨满鼓的图案最为丰富。这些图案由星星、树木（在很多时候是宇宙树）、动物、瘟神和人类等构成，其中人类的图案有时会是长着双翅的倾向，人们通常认为它可能是拿着萨满鼓的萨满。他们的萨满鼓上的象征图案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个单一的主题表达其象征意义。例如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哈卡斯人（Khakas）的萨满鼓上的图案分别代表着与萨满教有关的不同主题，如猎户座的图案可以帮助萨满在上界找到他的路；布谷鸟在萨满升入天界后帮助他保持与地面的联系；乌鸦是萨满长途旅行中的助手并帮助萨满取回病人的灵魂；桦树帮助萨满找到疾病的原因；萨满和七个女孩的模式表示萨满在进入昏迷状态时可以通过她们与他的观众们交流等等（Potapov 1968: 227）。不过这些鼓面的图案尽管丰富，生动表达着该群体的某些萨满教观念，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用于占卜。不过在萨莫耶德人和通古斯人中有通过将一鼓槌抛到空中，从它落下的位置来获得神谕的占卜方式（Hultkrantz 1991: 14-15）。

萨米人的萨满鼓也属于有很多图案装饰的类型，这些图案通过象征的表现方式体现着萨米人的萨满教观念。对照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对萨米人的萨满鼓的描述，萨米萨满鼓绘制的图案经历了一个由简到复的过程：在12世纪末成书的《挪威历史》中描写的那面鼓上的图案只是动物（一个鲸鱼和一头驯鹿）和交通工具（滑雪和一个有着船桨的船），可能是代表着萨满诺艾迪的助手神

灵和用具；而目前保存下来的主要是17和18世纪的鼓的图案则不仅较之早期的萨米萨满鼓，而且较之其它民族的有着类似装饰的萨满鼓，图案都更为丰富和多样。这些鼓图案既包括萨米人的萨满教信仰中的各种神灵，也包括各种与萨米人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还包括许多有着基督教的印记的图案。因此，很多学者参考《挪威历史》和其他的资料认为，萨米萨满鼓最初的功能是在诺艾迪需要进入入迷状态时作为一种辅助的用具而发挥作用，而作为占卜的工具的功能则是后来出现的，可能是受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或基督教的影响（Rydving 2010: 43）。正是萨米人的萨满鼓所承载着第二位的占卜的功能，使它不仅可以为萨满诺艾迪所用，也可以为每个家户的男性家长所用，萨满鼓上绘制着的图案，也因为占卜的内容的要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鼓面图案的丰富过程，除了可以用采借自斯堪的纳维亚和基督教的某些形式来理解以外，亦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萨米人在与基督教这种相异的宗教文化相遭遇的过程中萨米人自己的发明创造：“我的假设是将这些鼓的图案视作是萨米人内部的发展，将它们视作是与基督教这样一种有着排他性的要求的宗教对抗的结果，因此迫使他们表达自己的宗教，并给予其一个新的结构。宇宙观可能通过它在鼓面上的微观的表现来了解，通过鼓面上的‘他者的’图案，外来的强制性的基督教的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获得理解”（Rydving 2010: 44）。这些大多在鼓面上遵循着一定的传统规则分布的图案，以更为丰富的形式，一方面体现着萨米人萨满教信仰中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一方面也体现着萨米人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与萨满教信仰的密切关系，此外也体现了这种信仰与基督教相遭遇时所发生的变化。

萨米人的萨满鼓的这种有着丰富图案装饰的特性使其成为萨米人的萨满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萨满教盛行的年代，萨满鼓既作为萨满的萨满教实践的重要乐器和法器而发挥作用，又作为萨满和普通人的占卜用具而发挥作用，以萨满教观念的物质载体的形式将萨满教文化渗透和延伸到普通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去。在基督教努力消灭和取代萨满教这种“异教信仰”的时代，萨满鼓同时又发挥着作为萨米人的本土宗教与基督教相对抗的象征的作用：因为意识到萨满鼓在萨米人的萨满教信仰中的核心作用，基督教教会和当权者们很自然地并切中要害的通过禁止使用萨满鼓的做法迫使萨米人放弃萨满教信仰；而萨米人对于本土信仰的维护和对基督教的对抗则围绕着捍卫其使用萨满鼓的权力展开，并最终在强压之下转为藏匿鼓的行为。在基督教在萨米人地区最终取代萨满教后，蕴含着原有的萨满教信仰的大量信息的萨满鼓，超出了其曾经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萨米人的范围，作为世界萨满文化宝藏中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历史文物的作用，供人们研究和利用，以重构萨米人曾经的萨满教信仰的形态和特征。

5. 萨米人的萨满鼓与萨米人的萨满教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对于萨米人的萨满教的在世界萨满教体系中的位置，阿克·胡特克兰茨对此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论断，认为“萨米人的萨满教是在更东部的芬兰—乌戈尔人中发现的萨满教的向西延伸的类型”（Hultkrantz 1992: 143）。这一论断既明确了萨米人的萨满教与处于萨满教的核心区的西伯利亚各

族族群的萨满教的联系，也明确了它与之不同的发展变化，萨米人的萨满鼓就集中体现了萨米人的萨满教在世界萨满教体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尽管著名的宗教史学者米尔恰·埃利亚德 (Mircea Eliade) 所定义的广义的和普遍化萨满教视萨满教为一种古老的入迷技术，认为萨满的入迷术表现在灵魂能升入天国，灵魂能漫游中界，灵魂能降至充满亡灵的下界，萨满教的信仰和实践形式曾经并至今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各地 (Eliade 1974)。然而，狭义的萨满教研究依旧以最初获得大量记述和研究的西伯利亚的萨满教的基本特征为界定萨满教的基础，视萨满教为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族群中一种原初宗教信仰形式。阿克·胡特克兰茨则在狭义的萨满教分布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提出萨满教的环北极核心分布区的观点，视欧亚大陆北部和美洲大陆的北极部分的小规模的狩猎和采集民族为典型的萨满教的分布区，北极的萨满教在萨米人、西伯利亚的萨莫耶德人 (Samoyed)、尤卡吉尔人 (Yukaghir)、楚科奇人 (Chukchee) 和科里亚克人 (Koryak) 等等，以及爱斯基摩人中间发展。萨米人作为是分布在环北极的地理范围内、传统上以野生驯鹿等动物的狩猎和渔猎以及采集为生计来源的一个族群，正处在萨满教分布的核心地带，其萨满教作为“北极地区的萨满教与其他形式的萨满教相比，有着更为强烈的外在形态，这部分的是因为它的强度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严酷的气候和环境而更为突出，但同时也因为萨满在一个没有社会分层的社会结构中的显著地位而获得解释。北极的萨满教与环北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概念已由考古学家、民族家和宗教历史学家详细阐述。很明显，这一文化不仅从历史已经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不仅因为历史内容，而且因为它的文化和宗教的生态性整合” (Hultkrantz 1991: 11)。“很显然，在基本特质上，拉普人的萨满教是范围广大的北极地区萨满教的一部分，这一大范围的萨满教以深度的、僵硬症式的入迷和萨满灵魂的自由飞行行为特征。生态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其中历史的因素很可能植根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文化，共同造就了这样一种高度的萨满教的模式” (Hultkrantz 1979: 45-58)。而在环北极这个典型的萨满教的分布区之外的萨满教，如在西伯利亚南部、中亚、西藏、蒙古和远东的萨满教，则“已经在来自这些地区以南的更高的文明和宗教制度的影响力下发生了重塑。萨满的等级化、入迷的附体、有着丰富的象征符号的神服和丰富的装备是这种形式的萨满教的特征，但是它在许多方面似乎都是从北极的萨满教发展来的” (Hultkrantz 1991: 11)。

萨米人的萨满教作为同处环北极的典型萨满教区域的文化形式，它与其他群体的萨满教的普遍性的特点表现在萨满的社会功能是在守护神和助手神的帮助下，进入一种入迷状态，代表他的部落群体与超自然界建立联系，在此过程中，萨满鼓是帮助其进入入迷状态的乐器和在昏迷术中重要法器，是帮助其实现萨满职能的不可或缺的用具。萨米人的萨满鼓在首要的功能上与同处萨满教典型区域的族群一样，是萨满的施行入迷术的用具，其鼓的早期的框架式的形态，也与在其地理范围的东部的西伯利亚族群的形态无异。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萨满的专门服装的叙述和其他标志其身份的物品和象征的叙述，因此，萨满鼓作为代表萨满的人神中介的职能的用具，是萨米萨满教的重要实物象征。

萨米萨满鼓的第二位的功能是用于占卜，萨满鼓被用于占卜的用途既可以服务于萨满，也可以服务于普通的男性家长，鼓面丰富的象征图案被用作占卜的目的，这是集中体现在萨满鼓上的

萨米人的萨满教的特殊性之一。占卜是萨满发挥其职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所有信奉萨满教的群体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借用萨满鼓鼓面的象征图案进行占卜则为萨米人的萨满所特有；及至后来的普通的男性家长也大量的用鼓占卜的来解答生产和生活中的疑问，使其萨满教呈现出一种“家庭萨满教”的发展趋势（Bäckman and Hultkrantz 1978: 66），则更是萨米人的萨满教区别于其东部的西伯利亚群体的显著方面。因此对萨米人的萨满教的关注，在最初更多的被置于与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巫术的比较研究之中，姑且不论二者在相互影响上的源与流这一尚无定论的问题，至少二者之间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必然发生着相互文化上的采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化的采借的解释之外，萨米人自身历史发展中的因素也被纳入解释的范围，很多学者认为萨米人的萨满教呈现出这种与其东部的群体不同的变化形态的原因可以从萨米人从最初的小规模的狩猎社会向更高经济形式的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获得解释，在这一过程中，萨米人的生计方式从狩猎——包括驯鹿和其他野生动物，渔猎和采集为主向大规模的放牧驯鹿转变，家庭或小规模的生产合作群体西伊达（*siida*）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有关。

萨米萨满鼓上绘制大量的象征图案，一方面因为服务于占卜的功能，是我们了解萨米人的生产生活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是集中体现萨米人的萨满教观念体系的重要象征，这是集中体现在萨满鼓上的萨米人的萨满教的特殊性之二。萨满鼓被用作表达萨米人萨满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可以被视为萨米人在基督教的攻势下，主观上出于表达自己的宗教观念并使之结构化的目的而采取一种方式，在客观上，它则成为后世萨米人和萨满教研究者了解其曾经的形态的重要材料和依据。鼓面上大量与基督教有关的题材的存在，直观地反映了那个两种宗教对抗的历史过程中，基督教在萨米人中的存在形式，例如教堂已经在不断的建立，萨米人被不断的纳入到基督教的各种礼仪中，但是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依然深深的影响着萨米人，萨满鼓依旧是其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总之，萨满鼓作为萨米人萨满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是我们了解萨米人的萨满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借助对萨米人的萨满鼓在其传统的萨满教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分析，我们认识了萨米人萨满教所表现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面。对于这种体现在萨满鼓上的萨米人的萨满教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因探讨，我们将其置于萨米人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背景下展开。一方面，我们重视萨米人既处在环北极的萨满教典型区域，又地处连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地理位置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重视萨米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斯堪的纳维亚各群体的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注

1) “萨米”（*Sámi*）是萨米人的自称，意为“人们”。萨米人在历史上被外界称为“拉普人”（*the Lapp*），这

是一个贬损性的称呼，即“穿着破衣烂衫的人们”，萨米人生活的土地也因这一称呼被成为“拉普兰”（Lapland）。近几十年来，随着萨米人在国际社会中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其自称“萨米人”逐渐取代了旧有的贬损性的他称“拉普人”。

- 2) “基督教道路”这一图案是萨米人与基督教遭遇的时代萨满鼓鼓面上常见的图案，表现为由建筑物、人和牲口等图案构成的定居点或教堂村，这些图案经常是沿着一条线排列，因此被称为“基督教道路”。从文中引述这一占卜来看，基督教道路的图案对应着死亡，而萨米人的棚屋图案则对应着康复。这种对应关系也折射出萨米人当时对基督教的态度，即它与萨米人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就如死亡与康复的对立一样，基督教被视为是萨米文化传统的对立面，萨米人对它的态度是非常负面的。

参考文献

(中文)

刘桂腾

- 2007 《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以东北阿尔泰民族为例的地方叙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英文)

Bäckman, L. and Å. Hultkrantz

- 1978 *Studies in Lapp Shamanism*. (Stockholm Studi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16).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Eliade, M.

- 1974 *Shamanism: 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with a new foreword by Wendy Donig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ultkrantz, Å.

- 1979 Lapp Shamanism from A Comparative Point of View. *Fenno-Ugrica Suecana* 2: 45-58.
 1989 The Drum in Shamanism: Some Reflections. In T. Ahlbäck and J. Bergman (eds.) *The Saami Shaman Drum*, p. 11. Stockholm, Sweden: Almqvist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91 The Drum in Shamanism. Some Reflections. In T. Ahlbäck and J. Bergman (eds.) *The Saami Shaman Drum*. Based on Paper rea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Saami Shaman Drum held at Åbo, Finland on the 19th-20th of August 1988, pp. 9-27. Åbo, Finland: Donn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1992 Aspects of Saami Shamanism. In Mihaly Hoppál and Juha Pentikäinen (eds.) *Northern Religions and Shamanism*, pp. 138-145.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and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Pentikäinen, Juha

- 1997 *Shamanism and Culture*. Helsinki: Etnica.

Potapov, S.

- 1968 Shamanic Drums of the Altaic Ethnic Groups. In V. Diószegi (ed.) *Popular Beliefs and Folklore Tradition in Siberia*, pp. 205-234. Budapest: Akadémiai Kaidó.

Rydving, H.

- 1991 The Sami Drums and the Religious Encounter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 T. Ahlbäck and J. Bergman (eds.) *The Saami Shaman Drum*. Based on papers rea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Saami Shaman Drum held at Åbo, Finland, on the 19th-20th of August 1988, pp. 28-51. Åbo,

Finland: Donn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

- 2010 *Tracing Sami Traditions: Search of the Indigeneous Religion among the Western Sami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Novus,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Zachrisson, I.

- 1991 The Saami Shaman Drums: Some Reflexions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 Ahlbäck and J. Bergman (eds.) *The Saami Shaman Drum*. Based on papers read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Saami Shaman Drum held at Åbo, Finland, on the 19th–20th of August 1988, pp. 80–95. Åbo, Finland: Donne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Religious and Cultural History.